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 普 告 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112 期

2012 年 5 月 31 日

\*\*\*\*\*

## 目 录

### 【论 文】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  
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

郭志刚 李睿

### 【调研报告】

新疆南部农村的维汉通婚调查分析

李晓霞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sup>1</sup>

郭志刚 李睿<sup>2</sup>

**提要：**民族通婚既反映民族关系状况，又影响民族人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较快，有关研究推测族际通婚夫妇的生育水平及其子女倾向选择少数民族身份也是原因之一。本文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应用匹配程序开发处理，对族际通婚夫妇的初婚年龄和生育数量的分析表明，族际通婚能推迟婚龄并减少生育，族际婚姻子女偏向于选择少数民族身份。本文最后结合族际婚姻的生育数量评估了这种民族选择偏好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族际通婚 初婚年龄 生育数量 民族选择 人口发展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 55 个民族。在全部人口中，汉族人口占绝大部分，其他民族的人口较少，所以统称为少数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环境等种种原因，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语言、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对少数民族在多个领域实行优惠政策。尤其是进入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动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近些年来我国的总人口和汉族人口已进入低增长时期，但各少数民族人口则呈现出多元的变动性。黄荣清、赵显人主持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课题组认为，“影响一个民族人口的变化，既是人口再生产（出生、死亡）因素作用于现有的人口的结果，也可能有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民族成分的改动、通婚夫妇子女的民族选择、国际迁移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2005）。但是，目前在有关族际婚姻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成果仍然极少，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本文将通过 2000 年人口普查 1% 样本数据的深入开发，针对族际婚姻的有关方面及其子女在民族身份的选择状况

<sup>1</sup> 本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5 期。

<sup>2</sup>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睿，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加以定量的描述与分析。

## 二、有关文献回顾

族际通婚情况是测量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我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与民族演变的历史中，族际通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就我国目前的族际通婚状况，马戎认为“中国各族群之间通婚的整体程度，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更是远远高于今天的美国”（马戎，2004：454）。

族际通婚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由于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亲密接触和相互联姻可以反映族群交往中一个较深层面的发展状况，所以许多研究族群关系的学者把对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并且把族群间的通婚状况看作是测度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和英格（Simpson & Yinger, 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族际通婚率视作衡量美国各种族、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族群融合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数。

在美国族际通婚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的值得注意的因素大致有7个：通婚中的种族、族群选择；通婚夫妇中的性别比例；族际通婚的地区差异；族际通婚中的代际差异；族群人口相对规模对通婚的影响；影响族际通婚子女族群认同的因素；公众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参见马戎，2004：440）。

族际通婚随之带来了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选择问题。豪特和格德斯坦在研究西方白人不同民族通婚的儿童民族身份时认为，异族通婚为实践一个人的民族选择提供了机会。对于一些族群，异族通婚会削弱这个民族的传统，因为混合婚姻中的后代很少会记得他们原来族群的祖先。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族群，异族通婚提供了补充成员的机会，因为混合婚姻中的后代经常会认为自己是那个族群的一部分，他们把混合的民族传统简化为一种，或表现出对其中一个族群更亲近（Hout & Goldstein, 1994）。从他们的观点可见，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对某些民族是补充成员的机会，尤其是一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较高时，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对这个民族人口的变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影响族际通婚子女族群认同的因素，沃特斯认为，出生于不同种族、族群相互通婚家庭之中，这些混血子女对于自身的族群认同可以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社会中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如果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分层”和“优势族群”、“劣势族群”的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查这些混血儿在父母双方的族群中倾向于认同哪一方？分析影响他们进行选择的因素都有哪些？是政府规定的政策还是民间社区的无形压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果在一个社区里，混血子女在社会中受到男女双方族群的集体歧视与排斥，那么这个社区的居民在与他族成员恋爱时就会非常谨慎，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会影响和限制族际通婚的发生（Waters, 1990）。

谢宇等在对美国亚裔双种族儿童种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总结了以往有关文献，归纳为三个方面的研究视角：同化论或民族冲突的理论视角，文化和结构因素视角，家庭动态视角。同化论认为，当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越成功，他与自己的来源地文化的联系就越少，也就更倾向于确定为主导族群身份。而民族冲突理论则认为，当少数族群进入到主流社会时，他们的民族意识会提高。另外，语言的使用对族际通婚儿童种族身份认同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某个民族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居住集中程度也会对其产生影响（Xie & Goyette,

1997)。

在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中，父亲和母亲的影响对于结果可能是有差别的。威尔森的研究结果表明母亲肩负着初期向子女传递本民族文化的责任，并由此推测这些儿童的民族或种族身份更可能跟随他的母亲 (Wilson, 1981)。相反地，沃特斯认为父亲的民族在决定子女的民族身份时更加重要，因为子女明显会携带父亲的姓氏，而姓氏正是一个重要的民族暗示 (Waters, 1990)。

宏观环境影响方面，马戎 (2004) 认为，国家的法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可以对族群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对于族群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和政府有关政策的内容十分广泛。毫无疑问，在一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将会直接、间接地在不同层面 (整体、局部、个体) 影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许多政府的优惠政策使得被优惠族群的成员在社会流动机会和经济资源分配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先权”，可以得到很实惠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是制度化的，并得到政府的保障。这就使得具有被优惠的“族群身份”本身具有一种特殊“含金量”，并且还是可遗传的“社会资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套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即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并且，陆续建立和实行了多种针对各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比如，我国高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适当降分录取。这项政策始于 1950 年，文革以后，1980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2004)，对招生中民族优惠政策的发展成型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该规定一是明确“对边疆、山区、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录取分数可适当放宽”，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范围比边疆地区更为广泛，这一规定实际上起到了对少数民族增加照顾力度的作用。二是对聚居和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区别对待，对散居地区的考生虽然没有降分，但规定他们与其他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三是确定在部分重点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班。民族班招生可以较多降低录取分数，这无疑会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2005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2005) 中，将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政策写进规定。我国少数民族高考生将继续享受降分录取的政策。

我国从 1971 年起对汉族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少数民族地区除外”的政策，直到 1982 年 12 月经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 (彭珮云，1997: 44) 指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1984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精神的汇报》(彭珮云，1997: 24) 中说：“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生育政策中对少数民族生育的政策规定，在优惠程度上还有所不同。

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于族际婚姻中的子女选择民族身份有相当强的诱导性。我国建国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进行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识别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鼓励少数民族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习俗。这固然有利于民族平等、共同发展，但客观上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体现在族际婚姻中的子女民族选择问题上，就是这些子女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子女能更好地继承和学习其少数民族父母的民族文化和习俗，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少数民族。然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同时给少数民族身份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这种政策优惠为本人或他人谋利，也可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当族际通婚的夫妻期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这种“社会资本”时，会倾向于让子女选择少数民族身份。

鲁刚 (2005) 也同样认为，国家对少数民族在招生录取、考干提拔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

优惠政策，势必对不同民族通婚所生子女在选择民族成分时，产生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所生子女趋“少”，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所生子女趋“小”，即选择父母所属民族中人口更少的一方的导向作用，从而使民族通婚成为对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影响较大的提升因素。

我国近年来关于民族通婚方面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了民族通婚的比例及影响因素、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宗教因素的影响、对民族通婚的看法、对民族关系的满意度以及民族通婚圈等方面的研究（李臣玲，2004；汤夺先、高永久，2004；郑敏、高向东，2006；萨仁娜，2007；李晓霞，2004）。

归纳国内对民族通婚研究，理论上已经形成关于民族通婚子女身份选择的推论，这不仅涉及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问题，而且涉及到民族人口增长问题。然而，这些理论推论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和检验。现有民族通婚研究大多数是根据局部地区的调查统计资料的分析，不能推断对全国总体情况。并且，由于这些研究都是以婚姻为分析单位，研究对象中不包括民族通婚家庭的子女，并不能对民族通婚家庭中跨跃代际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我国在全国层面关于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身份选择情况的统计描述至今还是空白。

本文将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样本对族际婚姻的婚龄、生育及其子女的民族身份选择做出定量描述，并且本文将这几个方面的分析结果结合起来，探讨族际婚姻子女的民族选择倾向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影响幅度。并且，由于在理论上已经存在许多推论，因此我们对五普数据的这一分析也可以视为对上述民族优惠政策对族群关系影响的理论实证检验。

### 三、方法与数据

1990年5月国家民委等三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国家民委，1990）明确规定，我国公民“个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份确定”，“不同民族公民结婚所生子女，或收养其他民族的幼儿，其民族成份在年满十八周岁以前由父母或养父母商定，满十八周岁由本人决定”等相关原则。

在我国人口普查数据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口信息，其中也包含着每个人的民族状况，可以用于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数据处理将有关信息挖掘出来。我们在以前开发人口普查数据时形成的家庭户类型识别程序、夫妻婚姻匹配程序、母子匹配程序的基础上，将这三种方法综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结果的数据挖掘程序。

家庭户识别程序可以根据普查数据中每个家庭户成员与户主的关系，确定以户主为核心的代际结构，计算家庭户最高代与最低代的差值，从而得出每个家庭户的结构类型，生成新变量附着在每个案例上，郭志刚（1992，2004a）曾用这一开发程序进行了普查数据的家庭户人口分析。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问卷中新增加了关于初婚年月的问题，在“与户主的关系”的回答选项上也进行了改进，因而能够对户主的父母与岳父母、子女与媳婿进行细致划分；对“婚姻状况”的回答选项中对初婚有配偶与再婚有配偶进行了划分。这些重要的改进使得调查数据能够提供较多的信息对家庭户中有配偶者进行婚姻匹配，得以对北京市1995年1%抽样调查的样本原始数据匹配出来的婚姻信息进行了夫妻婚姻年龄差、早婚原因等有新意的分析（郭志刚，1999）。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沿用了上述调查口径分类，因此仍然可以进行家庭户识别和婚姻匹配。

母子匹配程序可以将每个家庭户内少儿与其母亲联系起来，本来是应用普查数据开发独

生子女信息和对普查近年的生育水平进行研究的（郭志刚，2001，2004b），但是如果将其与上述家庭户识别和婚姻匹配程序整合起来，便能够完成子女与父母双方的信息联接，于是便可以用于研究父母民族不同的条件下子女到底选报什么民族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既是定量地研究我国族际婚姻有关方面的经验研究，又是将家庭户识别、婚姻匹配、母子匹配方法综合起来深入开发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方法研究。

族际婚姻中的子女民族选择研究实际上涉及到父亲、母亲和子女三个要素，其中蕴涵着两种关系即：同代的夫妻关系和代际间的父与子或母与子关系。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族际婚姻中的子女民族选择就必须同时找到一对民族不同的父母及其子女。但由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我们必须根据人口普查问卷中提供的关于婚姻方面的变量（如性别、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和初婚年月等）和关于代际方面的变量（如与户主关系、曾生子女数等）进行相应的匹配，得到以婚姻为单位和以父子或母子为单位的有效信息，从而判定哪些是进行族际通婚的夫妻，以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情况。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匹配成功率是否较高。

本研究处理数据的民族匹配程序是在原有程序基础上整合而成，针对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新的分析要求，作了如下调整：第一，将原有适应过往数据的匹配程序，依照 2000 年五普数据格式，对有关变量的数目、编码进行了调整。第二，根据婚姻匹配程序得到的每一对匹配夫妻，引入他们的民族变量，比较夫妻民族是否相同，生成一个新变量记录民族比较信息，同时若民族不同，将丈夫的民族变量记录在妻子的案例上，即由妻子案例携带丈夫的民族信息。这些信息将用于分析不同族际婚姻类别中妻子的初婚年龄和曾生子女数的分析。第三，在母子匹配程序中，对于每一个匹配到母亲的子女，将其母亲案例携带的夫妻民族比较信息和丈夫民族变量以及母亲自身的民族变量都记录在子女案例上，以实现母到子的信息转移复制，最后即以子女为载体和分析单位，来考察族际婚姻中的子女民族选择问题。

## 四、育龄妇女的族际通婚分析

### （一）育龄妇女的婚姻匹配结果

通过以上操作方式将五普 1%样本数据进行夫妻匹配后，表 1 提供了年龄别的匹配率，表 2 提供了以各年龄组全部育龄妇女为口径计算的民族通婚不同类别的比例。其中，左侧依次排列有匹配到的夫妻的民族交互类别<sup>1</sup>，包括夫妻同为汉族、夫妻均为相同的某少数民族、妻为某少数民族而夫为汉族、妻为某少数民族而夫为另外的少数民族。然后，还包括了两类有配偶妇女但配偶未匹配到的情况，一类是没有在妻子所在家庭户中发现其丈夫，另一类则是因为妻子居住于集体户中因而不可能进行夫妻匹配。最后一类是现为未婚、离婚、丧偶的妇女，她们根本不适用于夫妻匹配。将这些未匹配类别同时列在表中只是为了对夫妻匹配结果做出评价。样本育龄妇女中真正有配偶的共有 248777 人，其中匹配到丈夫的共有 227530 人，匹配率达 91.5%。我们发现实际上匹配率是随着年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比如，15-19 岁组匹配率只有 86.4%，30-34 岁组则升为 91.0%，而 45-49 岁则高达 94.5%<sup>2</sup>。

我们发现，未能匹配类别中影响最大的是根本没有配偶的情况，她们将近占了育龄妇女的 1/4，主要处于年轻段。但是如果排除掉这些无配偶的育龄妇女以后，由于在集体户而未匹配的有配偶妇女的影响其实很小（几乎各年龄组都在 2%以下），而在家庭户中未能匹配到丈夫的有配偶育龄妇女到的比例在 15-24 岁约占 12%，其他年龄组中均低于 10%。因此，可以认为绝大多数育龄妇女都得到了成功的夫妻匹配，有关匹配分析结果可以大体上反映我国当前民族通婚的状况。

表 1、有配偶育龄妇女的夫妻匹配率

<sup>1</sup> 本文所用少数民族的口径按汉族以外人口定义。

<sup>2</sup> 也可以利用有配偶的家庭户户主与户内配偶来进行夫妇匹配。虽然这种方法相对简单，但其对有配偶育龄妇女的总匹配率只有 80.1%，主要是年轻组匹配率过低，比如 15-19 岁组匹配率仅为 32.9%，30-34 岁组则为 81.0%。

5 岁组	妇女人数	有配偶人数	匹配上人数	有配偶者 匹配率	户主配偶法匹 配人数	户主配偶法 匹配率
15-19	45410	493	426	0.864	162	0.329
20-24	41089	17585	15218	0.865	7945	0.452
25-29	52513	47545	41862	0.880	31115	0.654
30-34	58478	56880	51771	0.910	46082	0.810
35-39	51135	49828	46052	0.924	43710	0.877
40-44	38209	36950	34880	0.944	33873	0.917
45-49	41173	39496	37321	0.945	36414	0.922
合计	328007	248777	227530	0.915	199301	0.801

表 2、2000 年普查数据中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民族通婚的匹配情况 (%)

5 岁组	夫妻 同汉	夫妻 同少	妻汉 夫少	妻少 夫汉	妻少 夫另少	妻偶 未配	妻集体 户有偶	无偶	合计
15-19	0.6	0.3	0.0	0.1	0.0	0.1	0.0	98.9	100
20-24	31.4	3.8	0.7	0.9	0.3	5.0	0.8	57.2	100
25-29	71.2	5.4	1.1	1.6	0.4	8.9	1.9	9.5	100
30-34	80.3	5.2	1.2	1.6	0.3	7.5	1.2	2.7	100
35-39	81.8	5.2	1.2	1.6	0.3	6.7	0.7	2.6	100
40-44	83.3	5.1	1.3	1.4	0.2	5.1	0.3	3.3	100
45-49	83.5	4.7	1.1	1.2	0.2	5.1	0.2	4.1	100
合计	62.7	4.3	1.0	1.2	0.3	5.7	0.8	24.2	100
人数	205504	14104	3142	3956	824	18639	2608	79230	328007

表 3 提供了以夫妻匹配成功的民族通婚分布情况。它反映出，夫妻相同民族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90%以上）。在年轻组涉及少数民族的婚姻比例较大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初婚年龄要显著早于汉族，比如夫妻为同一少数民族在 15-19 岁组中的比例达到 31%，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这是因为这一年龄组的大多数汉族妇女尚未结婚的缘故。

表 3、2000 年普查数据中匹配夫妻的年龄别民族通婚的匹配情况 (%)

妻子年龄	夫妻同汉	夫妻同少	妻汉夫少	妻少夫汉	妻少夫另少	合计
15-19	60.3	31.0	1.9	5.4	1.4	100
20-24	84.6	10.4	1.8	2.5	0.7	100
25-29	89.3	6.7	1.4	2.0	0.5	100
30-34	90.7	5.8	1.4	1.8	0.3	100
35-39	90.8	5.8	1.3	1.7	0.3	100
40-44	91.3	5.6	1.4	1.5	0.2	100
45-49	92.1	5.2	1.2	1.3	0.2	100
合计	90.3	6.2	1.4	1.7	0.4	100

表 3 还显示出在民族通婚中更多的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与汉族巨大的人口数量相对应，同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确也有不排斥与汉族通婚的传统。另外，表 3 也显示出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并且似乎显示出在年轻一代中有增加的趋势。

## （二）民族通婚中妻子的初婚年龄

初婚年龄是代际间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初婚年龄几乎决定着初育年龄，两者之间间隔大约为 1.5 年左右。图 1 提供了不同类别民族通婚中妻子的初婚年龄。我们发现夫妻同为汉族时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22.20 岁，而夫妻同为某一少数民族时的平均初婚年龄（21.16 岁）要早 1 岁以上。同时，我们还发现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实际上明显提高了初婚年龄，比如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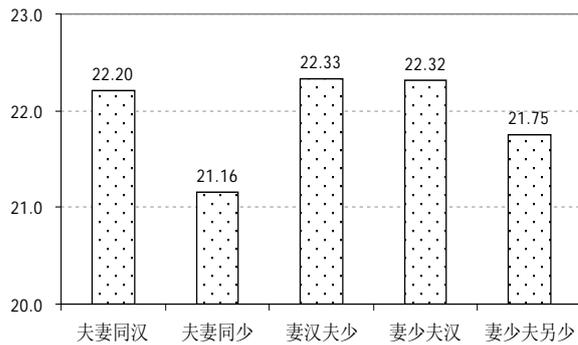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普查不同族际通婚中妻子的平均初婚年龄

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两种类型的妻子平均初婚年龄都在 22.3 岁以上，均高于双方都为汉族时的相应水平。即使是不同少数民族之间通婚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尽管这一类的初婚年龄显著低于汉族族内婚姻的水平，但是同时却高于双方为同一少数民族的相应水平在 0.5 岁以上（21.75 岁对比 21.16 岁）。

上述对平均初婚年龄的分析仅仅是描述性分析，我们尚不知其中民族间通婚是否反映了夫妻在个人社会经济教育等个人状况方面的选择性影响，是否包含了各类婚姻中的年龄构成的影响。这些都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分析。

### （三）民族通婚夫妇的生育水平

五普 1% 数据样本所能提供的少数民族族际婚姻数量有限，不便进行常规的时期年龄别生育水平分析。但是，我们可以从五普不同类别民族婚姻角度来对夫妇的曾生子女数加以分析，它实际上是不同出生队列在 2000 年时各自的平均累计生育数。

图 2 提供了民族通婚夫妇的年龄别平均曾生子女数，用以反映在生育水平上的差别。我们看到，生育水平最高的是夫妻为同一少数民族的类别，其次是少数民族之间通婚的夫妇。其他类别（包括夫妻同为汉族、妻为汉族夫为少数民族、妻为少数民族夫为汉族、以及家庭中已有配偶但未能匹配到的育龄妇女）大体都处于类似水平。

因此，中国的族际通婚实际上有利于降低生育水平。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婚的生育水平并没有高于（甚至还略低于）汉族内部通婚，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的生育数量也是显著低于同一少数民族内部婚姻的。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上图实际上反映出不同队列在 2000 年普查时的平均生育数，它们是各队列在不同年龄上的生育结果。由于 30 年来我国计划生育使时期生育水平发生了大幅度下降，因此图中的各类别的年龄别平均累计生育数其实反映了五普时不同队列在对应年龄上的状况，不能简单视为同一出生队列的年龄别累计生育曲线。举例而言，比如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任何一个类别在五普时 30—34 岁组育龄妇女再过 15 年的平均累计生育量可以达到该类别五普时 45—49 岁组的生育水平。这里涉及到时间、年龄、队列的三维问题，一次普查提供的横贯数据的信息不足以分析这种问题。<sup>1</sup>

<sup>1</sup> 郭志刚（2004c）曾讨论过这种问题，并针对以时期 35-39 岁组平均生育数作为当前终身生育水平的作法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会高估当前生育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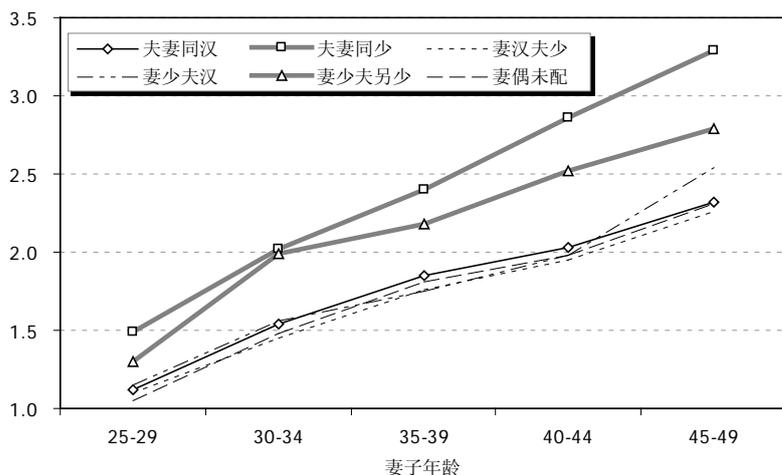


图 2、 2000 年普查不同族际通婚夫妇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 五、族际婚姻子女的民族选择

以上我们比较和分析了族际婚姻夫妇在初婚年龄和生育数量方面的情况，以下我们将在夫妻匹配的有关信息再附加到他们子女的记录中，然后对族际婚姻的子女一代在其民族身份选择方面的情况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 (一) 0-9 岁儿童的父母民族的匹配状况

将样本中 0-9 岁族际通婚家庭的少儿人口作为研究关注人群，主要是为考察 1990—2000 年这 10 年中族际婚姻的子女在民族身份选择方面的情况。

数据样本中 0-9 岁少儿人口经过程序匹配，根据父母民族的匹配情况，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表 4）：一大类是父母民族得到成功匹配的情况，占全部案例的 82.0%；另一大类则是父母民族未能得到匹配的情况，占全部案例的 18.0%。因此，匹配结果可以确定绝大多数少儿的父母民族情况，这就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民族通婚家庭子女中的民族选择情况。在未能成功匹配的案例中，有一半是母亲虽然得到匹配、但同一家庭户中未找到父亲；另一半为连母亲都未能匹配，以及极少数少儿因在集体户中而无法判别户内亲属关系。并且，进一步按年龄查看匹配情况时，少儿各年龄组的匹配成功率比较稳定，没有显著差别（表略）。

表 4、 2000 人口普查样本中 0-9 岁少儿的父母民族匹配情况

匹配情况	父母民族情况	合计	所占比例	本类合计
成功匹配	父母同为汉族	111189	71.7%	127148
	父母同一少数民族	11068	7.1%	
	母汉族父少数民族	1704	1.1%	
	母少数民族父汉族	2522	1.6%	
未匹配	父母为不同少数民族	665	0.4%	27909
	母少数民族父未匹配	1351	0.9%	
	母为汉族父未匹配	13125	8.5%	
	父母均未匹配	13236	8.5%	
	少儿在集体户	197	0.1%	
	总计	55057	100.0%	

在成功匹配父母民族的少儿中又可以根据父母的民族状况再细分为五个子类，其中父母民族不同且一方为汉族、另一方为少数民族的两个子类的少儿就是我们研究民族选择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些案例共有 4226 人，仅占全部案例的 2.7%，但是在成功匹配且父母中有少数民族的案例（15959 人）中却占到了 26.5%。因此，关注案例的绝对数量已经足够大，足以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中子女对民族选择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在少数民族家庭子女中又占有相当比例，因此其民族选择上的倾向足以对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产生影响。

###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

对于父母民族不同且一方为汉族、另一方为少数民族的少儿人口，他们的独特性在于他们的民族成份可以有两个选择，既可以选择汉族，也可以选择少数民族。假设没有民族的偏好及相关因素的影响，在完全随机的条件下这些少儿选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比例应该大致相等，在 50% 上下。

由表 5 可见，五普样本的目标少儿人口（即指父母中分别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 0-9 岁少儿人口）选择汉族的总比例为 32.6%，而选择少数民族的总比例则高达 67.4%，偏离随机选择达 17.4 个百分点。因此，实际数据分析肯定了族际婚姻家庭子女选择申报少数民族的明显倾向性，因而表明我国当前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这些族际婚姻的子女存在着较强诱导性，少数民族身份确有“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利益。

表 5 年龄别少儿人口的民族选择比例

年龄	父母分别为汉族和少数民族		父为少数民族、母为汉族		父为汉族、母亲少数民族	
	选少数民族 (%)	子女人数 (人)	选少数民族 (%)	子女人数 (人)	选少数民族 (%)	子女人数 (人)
0	64.8	438	88.1	176	49.24	262
1	71.1	357	91.7	144	57.28	213
2	68.8	414	93.0	157	54.09	257
3	69.7	432	93.7	174	53.49	258
4	67.1	413	88.3	163	53.20	250
5	66.7	463	92.5	186	49.46	277
6	67.0	397	88.5	157	52.92	240
7	66.9	420	89.1	192	48.25	228
8	68.3	426	94.7	170	50.78	256
9	64.2	466	91.9	185	45.91	281
总计	67.4	4226	91.1	1704	51.31	2522

从年龄分布来看，除 0 岁之外，这些少儿选择少数民族的情况略显示出年龄越小比例越大。这种现象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年龄变化，而是反映出近年来族际通婚家庭子女越来越倾向于选报少数民族身份。

由表 5 还能看到，对于族际婚姻的下一代而言，父母中谁是少数民族对其民族选择倾向有着明显不同的影响。当父亲是少数民族时，其子女选报少数民族的比例高达 91.1%，而当母亲为少数民族时，这一比例降为 51.3%。这说明，一方面在确定子女的民族身份时父亲比母亲更具有影响力，即子女的民族多数与父亲相同，这符合子随父姓的父系家庭传统；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父亲比汉族父亲更倾向于其子女跟随自己的民族及姓氏，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的强烈民族意识有关，也可能反映出现实利益驱动下的主动调整。

### （三）族际婚姻子女的民族选择对少数民族人口变动的影响

黄荣清、赵显人主持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课题组计算出，2000 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8.01% 增加到 2000 年的 8.40%，并且认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中存在像族际通婚夫妇子女的民族选择等社会因素的作用。我们将基于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样本匹配的上述民族通婚、生育及族际婚姻子女的民族选择的情况，对少数民族人

口增长方面的影响做一些简单的匡算估计。

样本中共有 0-9 岁少儿总人口 155057 人，实际申报为少数民族的占 11.1%，明显大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8.40%。其中，既有少数民族生育率较高和其他一些原因，也有族际婚生子女偏向选择少数民族身份的原因。但是，在讨论族际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倾向对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影响时，我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未匹配情况对此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表 4 中匹配成功的各类比例可以看出：族内婚姻为绝大多数，占了 96.2%，其中又是汉族婚姻占绝大多数。并且，成功匹配的三类族际通婚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间的通婚。上述这种分布情况是与总人口中汉族占极高比例所对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匹配案例中的后三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婚生子女<sup>1</sup>，没有民族选择问题，而他们已经占了全部未匹配案例的 95%。至于在母亲为少数民族且父亲未匹配的案例中，绝大多数情况则应该是父亲与母亲为同一少数民族<sup>2</sup>，也没有民族选择问题。因此，本研究中未能匹配少儿中属于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子女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不会对我们根据成功匹配案例的分析构成明显的影响。

已知涉及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家庭的 4226 人，并且其中申报为少数民族的有 2847 人，占 67.4%。假定如果这些族际通婚子女完全随机选择民族，即按 50% 比例，应该只有 2113 人选择少数民族身份。也就是说，此时样本 0-9 岁少数民族人口将减少 734 人，他们占到原来 0-9 岁少数民族人口的 4.3%。同时，汉族将与此对应地增加 734 人，其结果将导致占样本 0-9 岁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从原来的 11.1% 降低为 10.6%。

如果再考虑到那些未匹配到父母的少儿人口中还会有少量来自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那么按上述随机假设对民族的调整人数会略有增加，于是以上所计算的变化比例还会略有提高。

## 六、小结与综合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五普 1% 样本数据进行夫妻匹配和母子匹配的处理，将夫妻与子女的个人信息组合起来，对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时的平均初婚年龄、平均生育子女数以及族际通婚家庭子女对民族身份选择的情况进行了开发研究。

研究发现，夫妻同为某一少数民族时的平均初婚年龄（21.16 岁）要比夫妻同为汉族时的平均初婚年龄（22.20 岁）提前 1 岁以上。然而，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却能够提高初婚年龄，甚至略高于夫妻双方都为汉族时的相应水平，即使是不同少数民族之间通婚也比夫妻为同一少数民族的平均初婚年龄高 0.5 岁以上。

本研究还发现，中国的族际通婚实际上有利于降低生育水平。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婚的生育水平并没有高于（甚至还略低于）汉族内部通婚，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的生育数量也是显著低于同一少数民族内部婚姻的。从平均曾生子女数上看，水平最高的是夫妻为同一少数民族的类别，其次是少数民族之间通婚的夫妇，而夫妻同为汉族、妻为汉族夫为少数民族、妻为少数民族夫为汉族、以及家庭户中有配偶但未能匹配到的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都明显低于上述两种情况，并且大体处于类似水平。

在父母分别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 0-9 岁少儿人口中，选择少数民族的总比例则达到 67.4%，这种结果肯定了族际婚家庭子女明显倾向于选择申报少数民族，体现出我国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较强诱导性。并且，当父亲是少数民族时，族际婚子女选报少数民族的比例高达 91.1%，而当母亲为少数民族时，这一比例仅为 51.3%。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由于族际婚姻能够显著提高夫妇的初婚年龄并且大幅度地降低生育

<sup>1</sup> 比如，母亲为汉族而父亲未匹配的少儿中实际只有 1.1% 申报为少数民族；而父母均未匹配和在集体户这两类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8.8% 和 7.6%，大致对应着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8.4%。

<sup>2</sup> 这一类少儿案例中申报为少数民族的占 93.7%。

水平, 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族际婚姻在降低生育的影响与其子女偏向于选择少数民族的影响在方向上是相反的。并且降低生育影响在前, 其子女数量由此决定, 然后在这个子女数量中才有民族选择问题。

以夫妻为同一少数民族时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2.14) 为参照, 汉族与少数民族婚姻的生育数 (1.59) 只有其水平的 74.3%, 而夫妻为不同少数民族的生育数也仅仅为其 86%。其中, 只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婚才有子女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那么按照当前的实际偏好水平 (子女中平均有 67.4% 选择少数民族), 在其所生的 1.59 个子女中将会有 1.07 个子女 (=1.59\*67.4%) 选择少数民族, 而按无偏好假定 (50%) 则只有 0.79 个子女选择少数民族, 即偏好的影响差量为 1.07-0.79=0.28。也就是说,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来说, 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生育影响 (平均减 0.56 人) 要比子女选择少数民族身份的偏好影响 (平均增 0.28 人) 在绝对数值上恰好大一倍。这是在不区分夫妻谁是汉族、谁是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影响的匡算。

若是对夫妻分别做具体民族细分时, 根据前面的统计结果, 突出的选择偏好其实主要表现在丈夫为少数民族而妻子为汉族的族际婚姻类别中, 即这些夫妇的子女中有 91.1% 选择少数民族。这时这些夫妇的生育影响幅度与上面计算的结果差不多, 而偏好的影响幅度则提高为平均增 0.65 人。因此, 以这种口径计算的偏好影响幅度略大于生育影响幅度。但是, 请注意这两种相反影响并不能加以抵消, 因为偏好影响只能在生育影响的基础上发生作用, 因为即使其全部子女选择少数民族也不过为 1.58 个。也就是说, 现实偏好与无偏好假设的差别只反映在这 1.58 人的生育增长之内, 即现实偏好是将有 1.44 个子女选择少数民族, 而无偏好则只有 0.79 个子女选择少数民族。但是, 这类民族通婚子女数仅占父母分别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子女数的 40.3%, 因而又进一步限制了其选择偏好对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影响。

最后讨论一下从样本数据检查出来的族际婚姻子女的民族选择偏好会对总体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样本总人口 1180111 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103646 人。那么上述分析得出, 样本中如果消除民族选择偏好因素将使少数民族人口减少 734 人, 占样本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0.71%, 即是说在此假设条件下少数民族人口将只是原来统计的 99.29%。根据“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课题组提供的 1990 年和 2000 年的少数民族人口数以及这 10 年的人口增长率为  $r=15.22\%$ , 我们可以假定总体中族际婚姻子女在民族选择偏好的影响与本样本一致, 推算出在假定不存在这种民族选择偏好时的 1990-2000 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为  $r' = \frac{P_1'}{P_0} - 1 = \frac{P_1 \times k}{P_0} - 1 = 14.41\%$ , 其中  $k$  即 99.29%。也就是说, 族际婚姻子女的偏好导致这 10 年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提高了 0.82 个百分点。如果换算为年均增长率, 实际统计为 1.43%, 而假设去偏好后则是 1.36%, 即这一偏好使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提高了 0.07 个百分点。

#### 参考文献:

- 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第 4 期。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 1990, 《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 民委(政)字[1990]217 号, (<http://www.nanning.gov.cn/n16/n1277/n1382/n40148/n45234/n45383/766596.html>)。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 2004, (<http://www.seac.gov.cn/gjmw/zcx/2004-07-01/1165370092056570.htm>)  
中共中央统战部, 2005, (<http://www.zyztb.org.cn/zyztbwz/nation/xxdl/80200511040848.htm>)。  
郭志刚, 1992, “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家庭户资料的分析”, 《人口研究》第 3 期。  
郭志刚, 1999, “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 3 期。  
郭志刚, 2001, “利用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对独生子女信息的估计”, 《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1 期。

- 郭志刚, 2004a, “中国 1990 年代的家庭户变迁”, 载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郭志刚, 2004b, “对中国 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人口研究》第 2 期。
- 郭志刚, 2004c, “关于中国 1990 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人口研究》第 4 期。
- 李臣玲, 2004, “20 世纪 90 年代西北城市社区民族通婚调查研究——以西宁市城中区为例”, 《青海民族研究》第 2 期。
- 李晓霞, 2004, “试论中国族际通婚圈的构成”, 《广西民族研究》第 3 期。
- 鲁刚, 2005,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云南社会科学》第 4 期。
- 马戎, 2004,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彭珮云, 1997,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 萨仁娜, 2007, “德令哈市蒙、藏、回、汉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 1 期。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 2005,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 载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0 年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报告》(第二卷),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汤夺先、高永久, 2004,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黑龙江民族丛刊》第 4 期。
- 郑敏、高向东, 2006, “上海市民族关系现状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 Hout, Michael & Joshua Goldstein 1994, “How 4.5 Million Irish Immigrants Became 40 Million Irish Americans: Demographic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White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 Simpson, George E. & J. Milton Yinger 198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 Waters, M.C.1990, *Ethnic Opin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son, Anne 1981, “In Between: The Mother in the Interracial Family” *New Community* 9.
- Xie, Yu & Kimberly Goyette 1997, “The Racial Identification of Biracial Children with One Asian Parent: Evidence from the 1990 Census.” *Social Forces* 76(2).

## 【调研报告】

# 新疆南部农村的维汉通婚调查分析

李晓霞<sup>1</sup>

**内容提要：**在对新疆南部农村维汉通婚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南疆维汉通婚的特点，重点阐述汉族村落内的维汉通婚情况，探讨维汉混居村落的通婚少于维吾尔族村落和汉族村落的原因，指出维汉群体对通婚行为的态度差异还受到各自行为方式的影响。

---

<sup>1</sup> 作者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关键词：南疆农村 维汉通婚**

一般人对配偶的选择，易受自己文化背景的影响，而有同类相求的倾向<sup>1</sup>。这种婚姻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个人在其熟悉的人群之中生活，同时也有促使群体团结，维护群体边界的效用。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两族之间通婚的数值与两族间的关系存在相关。不同群体间通婚的比率被认为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社会整合过程等的一个敏感的指标<sup>2</sup>。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又可成为以后促进民族关系进一步融洽的原因<sup>3</sup>。

维吾尔族和汉族是新疆两个人口最多的民族，两族在许多区域，尤其是在城镇，彼此混杂居住，有广泛的交往机会。但新疆的维汉通婚明显存在着通婚数量少，通婚障碍大的现象。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 56 个民族中，维吾尔族是族际通婚率最低（有配偶人口中 1.05% 为族际通婚）、通婚指数（Kappa<sup>4</sup>）最高（男性为 0.996，女性为 0.994<sup>4</sup>）的民族。统计显示，越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与汉族人之间建立混合家庭的难度越大<sup>5</sup>。

2003 年、2007 年笔者分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和“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汉族居民”，持续关注南疆维汉通婚情况，尤其是 2010 年 1 月，笔者在南疆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的 11 个县对汉族农民进行专题调查<sup>6</sup>，对南疆乡村中的维汉通婚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本文即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 一、

新疆南部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域，2009 年，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总人口 813.37 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 88.6%，汉族人口占 10.3%。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在农村生活的居民数量较少。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 年三地区共有 288 个乡（不包括镇），15% 的乡汉族人口为零，15% 的乡不到 10 人，汉族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乡有 10 个，均分布在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区。和田地区乡村汉族人口的分布明显更少、更分散，全地区 76 个乡中，近 1/3 的乡没有汉族人口，1/4 的乡在 10 人以下，21 个乡汉族人口在 11~50 人。与之比较，阿克苏地区乡村中的汉族人口较多，有 44% 的乡，汉族人口在 300 人以上<sup>7</sup>。少数汉人长期生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里，为维汉居民的密切交往提供了的客观条件，维汉通婚应该较普遍，但现实并非如此。

如本文起始所言，同族婚配仍是婚姻的首选。南疆农村汉族人口数量少，居住相对分散，故在当地缔结族内婚姻很困难。但南疆汉族农民的婚姻市场并不局限于当地。一直以来，南疆农村汉人婚姻市场中就明显存在城乡区隔与民族区隔，择偶对象主要限于乡村和汉族，通过亲戚、老乡、邻里、朋友等的牵线搭桥，联姻范围扩大至内地诸省区的乡村。南疆汉族农民婚姻问题的主要指向是男性缺少配偶，其原因，当地汉族人口基本都属于内地来的迁移人

<sup>1</sup> 龙冠海《社会学》，（台湾）三民印书局印行，1983 年第 8 版，第 264、265 页。

<sup>2</sup> G·辛普森、J·英格尔，《族际通婚》，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80 页。

<sup>3</sup>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166 页。

<sup>4</sup> 通婚指数表示族内婚的比重，值为 1 表示该性别已婚者全部是族内婚，0 表示全部是族外婚。参见李晓霞“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人口研究》2004 年第 3 期。

<sup>5</sup> 李晓霞，“新疆民族混合家庭中的分布与构成”，《西北人口》2009 年第 4 期。

<sup>6</sup> 参与该调查的除笔者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吐尔文江·吐尔逊副研究员、古丽巴哈尔·买买提尼孜副研究员和杨富强助理研究员。

<sup>7</sup>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人口普查机器汇总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计算。

口或其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迁移者以未婚男性青年为主，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留在农村生活的仍以男性为主（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这里的年轻女孩更多地通过上学、打工、结婚等途径离开了农村）。所以，南疆汉族农民的婚姻主要通过从内地农村娶妻的方式解决，也由此成为内地对南疆农村汉族人口持续供给的渠道之一。

同时，在南疆各地仍有很少量的维汉通婚现象发生，举例如下：

喀什市瓦甫农场（农业综合开发区）有上千人（包括流动人口），其中 60%是维吾尔人、40%是汉人。据介绍，有 1 个维汉通婚家庭，丈夫汉族，妻子维族，结婚已 12 年，2 个女儿均已上学。（2000 年调查）

喀什地区岳普湖县阿其克乡奇色力克村，全村 345 户居民除 1 户汉族外都是维吾尔族，有 1 对维汉夫妻，夫维妻汉。女方是男方在天津做生意（烤羊肉）时结识并相恋的一位汉族女子，在天津举行婚礼后，回到村里生活不足半年。（2003 年调查）

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比西巴格乡格达库勒村，200 户村民中 13 户是汉族。村民介绍曾有 1 对维汉青年通婚，夫汉妻维。男方是该村汉族移民二代，女方是外村的维吾尔族。因为婚姻遭到的女方父母及亲属的强烈反对，两人在婚后离开了村落。（2005 年调查）

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330 户村民中维吾尔族占 70%，汉族占 30%。有 1 对维汉婚姻：本村的维吾尔族男子到外地娶了一位呼图壁县的汉族女子。据村民说，该村过去也曾有过维汉结婚的，或者已去世或者离开了。（2010 年调查）

和田地区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伊斯勒格墩村是个汉族村落<sup>1</sup>，全村 90 多户村民中有 4、5 户维汉通婚家庭，都是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2010 年调查）

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乡托万格拉克村，全村 76 户 300 多人，除 1 户回族、1 户藏族、2 户维吾尔族外都是汉族。村里有数户维汉通婚家庭，都为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2010 年调查）

南疆农村的维汉通婚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夫方为汉族、妻方为维吾尔族的婚姻相对较多。

伊斯兰教有严格的宗教内婚的规定，严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婚姻<sup>2</sup>。但如果有了与教外之人的婚姻，允许娶进非穆斯林女子；穆斯林女子若嫁给非穆斯林男子，男方必须入教<sup>3</sup>。在男性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女性结婚后基本是“从夫居”，即迁居到丈夫的家庭，追随夫方的民族生活习俗，子女也将成为夫方民族的成员。维汉通婚也同样，一般维吾尔族男子娶进汉族女子要相对容易。在和田地区皮山县的藏桂乡，几乎被调查人问及的所有维吾尔族家长都表示，儿子可以娶汉族女孩，但女儿绝不能嫁给汉族男孩<sup>4</sup>。但事实上我们发现，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的情况要相对较多于维吾尔男子娶汉族女子。

作为迁移人口的特征之一，新疆汉族人口中男性比例较高的现象曾较为严重，1944 年新疆汉族的性别比为 132（以女性人口为 100）。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大批的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干部、农民到新疆工作，以成年男性较多，2000 年新疆 60 岁以上汉族人口性别比例仍达到 127（女性为 100）。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自治区党委曾明令不准汉族男子娶少数民族女子<sup>5</sup>。在南疆农村，汉族男性的族内婚娶相对更加困难，因此娶维吾尔族女子的现象较多，至今仍然如此。除少数维吾尔族男性在内地经商或打工过程中娶了汉族女子外，在当地发生的维汉婚姻基本都是汉族男子娶维吾尔族女子。

<sup>1</sup> 该村有若干来自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村民，在当地生活多年。由于其姓氏、风俗等同于汉族，对外也自称是汉族人，所以一般被当地人认作汉人。

<sup>2</sup> 《古兰经》：“你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她们信道。已信道的奴婢，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她使你们爱慕她”。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25 页。

<sup>3</sup> 参见李晓霞《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111-112 页。

<sup>4</sup> 参见新疆师范大学 2002 级研究生孟志梅硕士学位论文《SOS 儿童村维吾尔“家庭”濡化教育》。

<sup>5</sup> 参见李晓霞，“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族际通婚政策的演变”，《西北民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2) 维汉通婚的数量及难度有着时代性的变化。

很多新疆人都认为，20世纪60年代维汉通婚的数量较多，80年代以后越来越少，而且通婚者承受的社会压力在不断增大。笔者在南疆农村调查时，该说法一再被当地汉族人证实。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汉族村）L（汉）的母亲是维吾尔族，娘家在多鲁乡，父母60年代结婚，80年代初迁到本村，此前所在村子里有4家汉人，其中3家都是维汉通婚。与L同村的Z（61岁，1985年结婚），表哥1961年来到该村，娶了维吾尔族妻子。1980年Z的两个弟弟来到该村，其中一个后来也娶了维吾尔族妻子。Z说大哥的儿子和自己也差点与维吾尔族女子结婚，“多鲁乡到这里有10多公里，80年（那里的）维族女孩也追我，那时候（维汉）关系好。”而侄子和一个维族女子相互看上，大哥家和女方家已经商议财礼，最后没成，Z说是因为侄子“太老实，配不上人家姑娘”。

如果不考虑社会或文化因素，仅从婚姻者个人的角度看，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汉族人口比例失调的原因，汉族男性在择偶过程中跨族联姻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汉族男子家庭负担少（迁移人口的特点），经济能力较强，能够帮助妻子做家务，愿意嫁给汉族人的维吾尔族女性也是有的。那么在这些问题基本未变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维汉通婚数量减少，难度增大，除了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使汉族男性可以增大择偶成本和扩大选择空间外，更主要的原因被归为，民族分界意识上升，新疆维汉两族社会，尤其是维吾尔族社会，对于维汉通婚者及其家庭的群体性压力增大，由此也影响着维汉关系的变化。

(3) 维汉通婚相对在单民族聚居村落较易出现，维汉混居村落却相对较少。

在理论上讲，男女居住地的邻近会增进彼此的交往和感情交流，从而增加族际通婚的可能性。但在新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维汉人口均有一定数量的混居村落，很少能访到维汉通婚家庭，虽然这样的村落内部族际互动较频繁，语言交流障碍也较小。与之相反，我们调查到的维汉婚姻，大多数出现在以汉族人口或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村庄，尤其是和田地区洛浦、策勒这类汉族人口比例很小的区域里，在那里为数不多的汉族聚居村落，也出现多例维汉婚姻。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其原因后文将详细论述。

(4) 维汉通婚家庭中，家庭文化趋向“汉化”或“维吾尔化”的现象都存在，但基本与娶或嫁无关，而取决于社区人口的民族结构。

在民族混合家庭中，一般夫妻对配偶一方的民族文化的不同事项，有着不同程度的吸取和适应，在生活中表现出了来自双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受家庭中居主导一方的文化影响更为明显。在男娶女嫁的婚姻中，女性结婚后，应当移居到夫方家庭或其家庭所在社区生活，混合家庭受到夫方家庭影响较深，夫方民族的文化往往也是混合家庭的主导文化。在南疆农村，迁移并定居在维吾尔族村落的汉族男性，即使娶了维吾尔族女子，但仍然生活在女方家庭所在或其文化背景下的社区，其“维吾尔化”成为必然，典型的如《南疆故事》中疏勒县的杨庭章<sup>1</sup>。而在汉族聚居村，维汉通婚家庭基本倾向于汉族文化，在语言、风俗甚至子女的族属选择上都有“汉化”的倾向。

## 二、

南疆农村中，汉族聚居村落数量很少，但各县市都有。2010年笔者一行在泽普县赛力乡赛力新村（亦称汉族大队）、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伊斯勒格墩村（亦称汉族大队）、策勒县策勒乡托万托格拉克村（亦称汉族农场）调查时访问了几户维汉混合家庭，都是夫汉妻维的

<sup>1</sup> 杨庭章原在新疆和平解放时起义部队，1961年修完兰新铁路后响应党的号召到疏勒县一个距县城80多公里的偏远小村当农民。来时5人，以后4人离去，全村只他一个汉人。1965年，杨和一位离婚的有着3个儿子的维吾尔族妇女结婚，生了4个儿女。孩子们都报维吾尔族，不懂一句汉语，在当地和维吾尔族人结婚成家。杨穿维吾尔族服装，维语很好，汉语不太流利，只是一直不信伊斯兰教。见王有才《南疆故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7-129页

婚姻形式，并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 维汉通婚者的家庭生活明显偏向于汉族的生活方式。

这种偏向于汉族的家庭生活方式，表现在家居布置、夫妇家庭分工、生活方式、节日习俗、女方的服饰打扮，甚至是饮食生活等方面，但在程度上又有区别，饮食方面的表现最明显。家庭中通常为女性做饭，有的维吾尔族主妇不做也不吃猪肉，有的只做不吃，有个别的也做也吃。如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的 L 兄弟（汉）娶了一对维吾尔族姐妹，L 家吃猪肉（也不隐瞒），L 弟弟家不吃。对于主妇不做不吃的家庭，丈夫和孩子到外面吃的行为一般也不被禁止或责怪。同时，女性在家庭角色中，如同汉族妇女一样承担很多生产劳动，丈夫也帮助妻子做些家务，对妻子更多地忍让和协商。

丧葬礼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表现了人对自己归宿的认识和安排，具有浓厚的宗教象征意义。对处于维汉两种文化边缘的人来说，以什么方式进入另一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心结。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境内的兵团农三师 47 团，有一些建立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维汉通婚家庭，嫁给汉族的维吾尔族妇女基本采用汉族一方的生活方式，当她们去世时，丧葬成了难题。按维吾尔族传统习俗，与非穆斯林结婚者，死后不能葬入穆斯林墓地。每当维吾尔族职工去世，团里就要派人征得附近乡里阿訇同意解决丧葬之事。90 年代末团场划了一块土地作为穆斯林公共墓地，受到广大穆斯林职工的欢迎<sup>1</sup>。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疆某些地方宗教意识上升，一些与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结婚的人被本族社会孤立，将来死后能否进入本族墓地，困扰着这些人，甚至有一起生活多年的老夫妻因此而离婚。笔者在调查中，也听到有两位长期居住在汉族村的维吾尔族老人，在年纪大、身体状况不好时住到维吾尔族村落的亲戚处，度过最后时光，以便能顺利进入穆斯林墓地。但同时，村民说到有嫁给汉族的维吾尔族女性去世后，以汉族的方式埋入汉族墓地的，还有维汉通婚的夫妻已经做好棺材的，有一位嫁给汉族的维吾尔族妇女就明确地对笔者说，她以后和丈夫一样进棺材。这种选择态度，笔者以前在南疆的调查中从未遇到过。

(2) 维汉通婚家庭子女的维吾尔语程度普遍较差。

汉族聚居的村落，居民交流使用汉语，孩子进汉语授课学校接受教育，即使是维汉通婚家庭的孩子，汉语程度也普遍较高。如洛浦县的 L（36 岁）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自己认同汉族。小时生活在维吾尔族村落，兄弟姐妹的维吾尔语都很好，后来搬迁到汉族村落。L 与弟弟先后娶了一对维吾尔族姐妹，但很少说维吾尔语：“我一般不喜欢说维语，迫不得已才说，和维族人、家里干活的小工才说维语。两个孩子都不会维语，在家不说维语，不愿说，不愿学。儿子现在大一点了，还是后悔了，女儿可以听懂，不会说。”策勒县托万托格拉克村 A（维吾尔族）的大姐与该村的汉族农民结婚，4 个孩子都已成家，男方一直就不会维吾尔语，孩子们可以用维语进行简单交流。

(3) 维汉通婚家庭与维吾尔族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少。

由于维汉通婚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被排斥，通婚者家庭在维吾尔族社会的地位下降，与同族成员往来较少。上述 L 妻（维）还认为与本族人往来多会影响他们夫妻的关系：“我很少和维族人打交道，不管男女都是。过年，都是和本大队的维族来往。她们（指来村里打工的维吾尔族妇女）会说念经了没有，怎么不离婚等等，对生活影响大。（夫妻吵架）他们维族人来说，不劝，就说离婚，要不死后还去棺材里。汉族人（来）会劝好好过日子。”L 妻的婚姻不能被本族人理解和接受，她就以回避和本族人交往、避免建立私人关系的方式保护自己家庭生活的独立性。

有的汉族村落相对偏远，客观上也造成维汉村落的相对隔离。H（42 岁）与妻（维）结婚

<sup>1</sup> 任一飞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维吾尔卷（墨玉县）》，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第 201 页。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皆行土葬，仪式按伊斯兰教的礼仪进行，盛行速葬，一般早亡晚埋，晚亡午葬。以白布裹尸，在清真寺举行葬礼，由阿訇念经并致悼词。

近 20 年不会维吾尔语，与女方亲戚的往来很少，曾骑摩托车带妻子参加过一次婚礼。他说：“她姨姨家的儿子结婚，去了一次。他们都在看我，好像一个汉族人在这里挺奇怪的。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人看，再也不去了。我不去她就不去了，没人送她去。”H 妻说：“这里维族人不多，旁边一个 60 多岁的老人，有时往来。不和上面七、八大队（维吾尔族村落）的人往来。”H 认为维汉通婚难的根本原因是相互有歧视，“如果一个丫头嫁给汉族，她就在队上没地位。”不与女方亲友所在社会来往，也是避免受到歧视的被动之举。

（4）维汉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偏向父亲一方（汉族）。

根据我国的政策，不同民族的公民结婚所生子女，其民族成份在满 18 周岁以前由父母商定，满 18 周岁者由本人决定，年满 20 周岁者不得再更改民族成份。过去民汉通婚子女一般遵从选择父亲民族成份的习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现了明显的选择倾向：民汉通婚家庭，子女绝大多数选择少数民族一方的民族成份，小部分选择父亲一方的民族成份。其原因与当时相继出台对少数民族在升学、生育、就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有关<sup>1</sup>。笔者在这几个汉族村落调查中发现，这里的维汉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分倾向于选择父亲一方（汉族），有的家庭到孩子面临升学问题时，才设法去改民族成分。

策勒县的 H 在 1991 年结婚，有 3 个儿子（维汉通婚家庭可生育 3 个孩子，从少数民族一方），报户口时都报的汉族。到大儿子要办身份证时，曾想改成维吾尔族，派出所说汉族名字不能报维吾尔族，只能作罢。H 说儿子们长得都像维吾尔族，“如果报维族，可能会有照顾，不多。不再想改儿子的民族成份，（他们）不会维语，改名字也不顺口。”大儿子在乌鲁木齐市上中专，不愿让同学知道自己的混血身份。同村的另一户维汉通婚家庭，4 个孩子也都报的汉族成份，其中 2 个女儿都嫁给汉族男子，2 个儿子娶的都是维汉混血女子。

改民族成分都是出于功利目的，但在文化上也可能带来由不认同到认同的变化。洛浦县的 L，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兄弟 4 人全报的汉族，但一个弟弟后来为升学得到照顾改成维吾尔族，现在 30 岁，在某县当乡长。L 一对儿女（分别是 15 岁、12 岁）原来也报的汉族，后来才改为维吾尔族。改民族成分的原因非常现实，L 妻（维）说：“小时我儿子不愿意改民族（汉改维），哭得不行。他们班的同学说，管他维族、汉族，老师也劝。（改民族成分）对进疆内初中班有帮助，他们少数民族 180 分可以走，汉族 260 分才行。”调查时 L 的儿子正在上疆内初中班，对自己以前没有学习维吾尔语开始感到后悔。

（5）维汉通婚者多为混血或通婚者的亲友，社会地位相对弱势，汉族村落某种程度成为维汉通婚者躲避维吾尔族社会压力的场所。

在南疆农村，汉族聚居村落一般建在后开发区域，村民是后迁移来的，维吾尔族人口很少，有的就是维汉通婚者的亲属。也可能是维汉通婚的维吾尔族一方的家人在维吾尔族村落受到较大压力，有的就全家搬到汉族村落，与女儿共同生活。泽普县 B 是北京人，1966 年集体支边到了兵团工程第三师，1970 年娶了维吾尔族妻子，后所在连队调到且末县，因解决不了妻子的户口又转到赛力乡的维吾尔族大队，1974 年乡里成立汉族大队（即赛力新村），他也迁到这里，后来妻子的父母都搬到了汉族队。策勒县托万托格拉克村维吾尔族妇女 A 丈夫一家，因大姐嫁到了该村，从原来的维吾尔族村落搬到这个汉族村落。30 多年过去，大姐的生活与该村的汉族妇女差别不大，母亲却回到了原来的村落，希望离世后能进入同族墓地。偏向汉族生活习惯的维汉通婚者也选择汉族村落生活。L 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在的维吾尔族村落有 4 家汉族，其中 3 家是维汉通婚，除“被维族同化了”的一家外，其他都搬到了汉族村。

维汉通婚者，不论是汉族一方还是维吾尔族一方，多为当地社会中经济地位或社会地位相对弱势者，如男性家庭贫困、势单力薄或孤身一人，女性家庭困难、社会地位低或个人在家庭内不受重视、有过婚史和孩子等，故而在本族社会中寻找合适配偶的机会较少，选择异族通婚时社会压力也较小。当然也有一些家庭及个人条件都较好的人为真挚的感情而冲破家

<sup>1</sup> 参见李晓霞《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254-260 页

庭和社会的阻力走到一起。维汉通婚者的子女和亲友容易缔结维汉通婚，除其可能偏见较少外，也与其因混血身份或与维汉通婚者的关系而在本族社会择偶难度增加有关。L 自己是维汉混血儿（认同汉族），L 妻（维）三姐妹都嫁给了汉人，她们的两个姑姑在更早的时候嫁给了沙雅县的汉人，L 妻婚前曾在姑姑家帮忙照看孩子，姑姑家就是汉族的生活习惯，可以说嫁给汉人是她唯一的选择。

### 三、

如上文所说，南疆汉族聚居村落更易于维汉通婚家庭的存在和生活，这与维汉混居村落通婚情况较少有着共同的原因。

如果从现代婚姻过程（年轻人密切交往→产生感情→缔结婚约）或者从农村婚姻的缔结模式（家庭彼此知根知底，双方亲友对儿女印象不错，撮合两个年轻人的婚姻）来说，混居村落都应该有更多的族际通婚者出现，这也符合混居→交往→了解→友情→婚姻→融洽的理论逻辑。但实际情况是，在南疆维汉混居村落，族际婚姻反而较少发生，而且遇到的社会压力较大。

可以有这样几种解释：

其一，维汉混合村落内仍存在相对隔离现象，维汉村民的交往较多地限制在本民族村民范围内。所调查的南疆维汉混居村落，实际大多是人数相对较少的汉族村民相对集中居住，或者聚居同一村民小组（多称汉族小队），或者集中居住一起<sup>1</sup>。反映出空间距离的邻近并不一定增大交往频率和减少心理距离。

其二，混居村落中，维汉村民各有一定数量，受到习俗、语言、宗教、亲属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相互交往交流频繁、文化上也相互学习借鉴，但族群界线仍是很清楚的，而乡村的婚姻是双方家庭生活深层渗透和融合，会使诸多的社会关系被改变。由于对于跨族联姻的不确定性和文化适应的难度，反对通婚是常态，混居村落中试图越界的人及其家庭需要承受来自维汉两个群体的直接社会压力，有可能被两个群体共同排斥。

其三，受到社会大背景的影响，民族意识上升、族际关系紧张会直接在混居村落中反映出来。新疆近 20 多年来，在维汉两族成员往来愈益频繁的同时，维汉民族间的界线却更趋严格，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异民族的认异心理在增强，宗教对维吾尔族民众社会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加深，维汉通婚的难度明显增大。调查中听到数位维汉通婚者谈到通婚比过去难的原因，是“以前穷，不管这些”。洛浦县的L说到父母的婚姻（父汉母维），认为没有那么难，当时母亲家反对，乡干部劝说，答应给些照顾，让家人吃饱，家人就同意了，“现在信教太严重，那时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那么多事。”维吾尔族、宗教意识上升以及维汉关系的变化无疑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宣传及活动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由过去更多注重现实物质生活的改善，向追求本民族独有的精神生活变化，纯洁民族的血统和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期待。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当生理需要满足后，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开始依次被重视。“对很多人来说，族裔纽带是忠诚、骄傲、地位、归属、避难、认同、接纳和安全一类的事情”<sup>2</sup>，“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sup>1</sup>。将这些情感和需要适当地转移到其它寄托（如国家、阶级、职业等）之上，可能可以起到淡化民族或族群意识的作用。

在单一民族聚居村落中，维汉通婚现象相对较多，存在相对较易，笔者以为是因为通婚者（往往是外来者）无从选择，而只能同化于村落文化，与村民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消减

<sup>1</sup> 李晓霞“聚居与散居——新疆南部汉族农民的居住格局与维汉关系”，《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sup>2</sup> [英] 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甚至消除其异文化的身份，以此避开或减小社会压力，其代价是疏远本族社会。因此，维汉通婚者在维吾尔族村落表现为“维吾尔化”，在汉族村落则表现为“汉化”，这种婚姻及其后的“同化”一般是族际婚姻者自己选择的结果。由于表现为当事人的自主适应，并因与本族社会隔离而有较少的阻力，基于适应新社会环境的重新社会化过程也就相对顺利，夫妇双方因族际差异表现的文化冲突也相对较少，并较易获得同化方社会的支持。由此民族聚居村落反而有通婚者存在的空间。

显然，这种维或汉聚居村落中维汉通婚者相对较多的情况，与维汉两种文化的明显差异性<sup>1</sup>及维吾尔族对族外婚、教外婚的排斥有关，而复杂的维汉关系背景是更需要考虑的<sup>2</sup>，表现为少数超越世俗和文化鸿沟的感情，或者有结婚成家强烈需求的个体对强大社会压力的一种顺应<sup>3</sup>。这种整体下的维汉关系的复杂或紧张，自然增大了少数族际通婚者的同化压力，使由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个体构成的“混合家庭”很难维持“混合文化”的特点，很快外显为单一文化的特征。如果说族际通婚者本身还保留着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再社会化很难彻底，那么至其第二代基本就表现为单一民族特性，即完全“同化”。也有混血第二代的民族属性与文化认同有差异（如上述改民族成份之例），而成为两种文化的“边缘人”，这种身份困惑有可能使其文化上兼收并蓄。因此，同是混血儿，却有“同化人”和“边缘人”之分，前者表现为民族成分和文化认同的一致，后者则为两者的相对分离。后者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承认难度更大，却可能因其“边缘”之身份而有双重的认同并在两族关系中起到更多的中间作用。

在维汉通婚的调查中，多数人都表示来自维吾尔族社会的阻力更大。在南疆的汉族聚居村落和维吾尔族聚居村落，分别都存在维吾尔族融入汉族（人数极少）和汉族融入维吾尔族的现象。比较起来，维汉通婚家庭，倾向于汉族习俗的，其子女被汉族社会接纳相对容易；倾向于维吾尔族习俗的，其子女较难被维吾尔族社会接纳（表现在婚姻问题上比较明显，即很难在同族中择偶）。在对维汉通婚的态度上，维吾尔族群体与汉族群体反应的差异性，除与维汉两族对族外婚态度不同有关<sup>4</sup>外，也与两族行为方式的差别有关：维吾尔族人更易受到群体意识的压力。

在南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族内互动方式的不同，反映了维吾尔族群聚性和汉族个体性的特点：维吾尔族居民的互动频率较高，各种人生礼仪、节日活动等礼仪性的往来以及家庭间的私人往来等普遍比较频繁；南疆汉族居民个体及家庭性的互动和娱乐性活动交往多，如打牌、打麻将等是汉族农民休闲的重要方式，关系好的人走动较多，关系不好的很少来往。这一特点与汉族人普遍内敛持重的性格有关，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际交往中的“差序格局”有关，也与其作为迁移人口的亲属关系简单、社会关系积淀不深有关。显然，与本族群体联系越密切的，内聚力越强，个体独立意识或行为越受到群体意识的规范；与本族群体联系少的，内聚力相对较弱，群体压力较小，行为的相对自由度较高。

笔者认为：在南疆农村的维汉交往中，维吾尔族偏向于群际关系，汉族偏向于人际关系。受到人口规模结构的影响<sup>5</sup>，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接触相对较少，对汉族的认识多来自群体内

<sup>1</sup> 秦晖《“左右多元化”最能淡化民族认同多元化》，《南方都市报》2012-03-04，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sup>2</sup> 上世纪30年代，维吾尔族（当时称缠回）与汉族的关系被一些人认为是“亲善”的，“交际没有私毫嫌隙，并且还有通婚的”。（民国）王云五、李圣五主编《新疆与回族》，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28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77页。

<sup>3</sup> 英格尔(Yinger,1981)认为，当群体之间不是高度敌对或在文化上完全不同时，文化适应将是补充的而不是替换的。[美]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sup>4</sup> 维吾尔族在婚姻上表现出极强的内聚力，与异族结婚普遍不被支持，尤其反对与非穆斯林通婚；汉文化对于族际婚姻没有限制性的规定，与异族通婚阻力相对较小，加之人口数量巨大，与各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异族通婚广泛。参见李晓霞《新疆民族混合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sup>5</sup> 布劳分析，对于群体的任何二分法来说，小群体的群际交往率必然超过大群体，在通婚的群体成员比例、平均的群际交往朋友数、群际交往所占用的平均时间量等方面，小群体均高于大群体。“两个群体在规模上的差异越大，那么它们在群际交往率上的不一致性就越大”。[美]彼特·布劳著，王春光、谢圣赞译《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6、87、352页。

的他人，缺少个人经验，信赖族人传授，遵从集体意识；汉族人与维吾尔族人接触相对较多，个人的经验感受较多，即使群体间发生冲突，私人友情还可保持。在南疆，汉族人群聚意识弱也使他们有时会产生被欺负或被边缘化的感觉。由于汉族群体对个人生活的干涉较弱，个体选择的自由度就较大，在族际交往中表现得较为宽容，对维汉通婚的认可度也相对较高，反映出汉族的族际边界更为灵活。

**【编者按】**

关于族际通婚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中国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基本状况，可参见：

马戎 2004，《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十三章 族际通婚。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中的“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112 期均可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